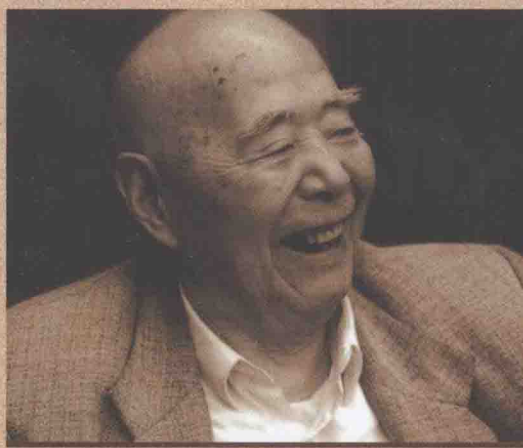


钱谷融文集

【卷三】
对话卷



有情的思维

钱谷融 ● 著

钱谷融文集

【卷三】对话卷

有情的思维

钱谷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谷融文集. 对话卷:有情的思维/钱谷融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752-5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钱谷融-文集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217.2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093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薛 羽

封面装帧 王震坤

钱谷融文集

对话卷:有情的思维

钱谷融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1.25 插页 16 字数 1,418,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52-5/I·1177

定价 280.00 元(全四卷)

目 录

个性·启蒙·政治

——与吴俊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1

作家要有一颗博大的心

——答王雪瑛问 6

关于无边的人道主义

——与殷国明对话之一 10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一)

——与殷国明对话之二 28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之二)

——与殷国明对话之三 39

关于真诚

——与殷国明对话之四 63

关于艺术的魅力

——与殷国明对话之五 83

关于艺术创作是一种“有情思维”

——与殷国明对话之六 101

关于“不可无我”

——与殷国明对话之七 123

关于艺术的具体性

——与殷国明对话之八 148

关于艺术创作的生命与动力	
——与殷国明对话之九	175
关于艺术女神与通俗文学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	198
关于独创与宽容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一	218
关于文学批评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二	248
关于读鲁迅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三	275
再谈关于读鲁迅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四	306
关于曹禺及其创作	
——与殷国明谈话之十五	355
再谈曹禺及其创作	
——与殷国明对话之十六	386

个性·启蒙·政治

——与吴俊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俊 明年(19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今天我想就这一类问题向您请教一下,特别是想请您谈谈关于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些看法。

钱谷融 一般来说,一切被称为历史的东西,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但是一切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重大事件,必然会在现实中留下它的痕迹,并对后世长久地产生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也不例外。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弄清楚今天与昨天的联系,弄清楚过去的东西对今天究竟有些什么影响?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影响并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议论以往的得失,多少难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是我们往往是只能做个事后诸葛亮的,一定要到事情过去了,我们才会变得聪明起来。有时,甚至连事后也聪明不起来,尽管

不断地碰壁，不断地“付学费”，就是坚决不改。这样的事例，历史上是颇不少见的。

吴俊 确实，我们现在来回顾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虽然也能感觉到中国文学在短短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如何令人惊喜，但同时却也无法回避其中所暴露出的种种艰难波折与错误。我觉得，从积极一面看，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而前进的过程；但从消极一面看，则也是一个不断地犯错误或失败的过程。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主要是联想到建国以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实则是以前新文学风波的继续，其中，人为的或由于主观原因而带来的损失，更是令人心寒的。仿佛总是有一种重要的因素或势力在不断地阻碍着中国新文学健康顺利地发展。还是请先生从五四谈起吧。

钱谷融 只要一谈到五四时代，我们就不禁神采飞扬，向往不已。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当时的先驱者们，是那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眼看着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就要降临到沉睡多年、死气沉沉的中华大地上来了。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先驱者的努力并没有能长久持续下去。过不了多久，《新青年》团体就解体了。新文化战线发生了分化，战友们的目标不一致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灿烂之花，还没有结成丰硕之果，就忽然凋零了。现在回首往事，真令人不胜感叹。

吴俊 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似乎确实未能完成它的全部使命，但它毕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钱先生，您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或特征，主要是什么呢？

钱谷融 陈独秀曾称“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其他一些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在以后的文章中，也一直把人的觉醒解放和思想革命当作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特征。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我而存在了。”茅盾说：“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

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关于创作》)鲁迅也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草鞋脚》小引)》所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突出标志,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出现。

吴俊 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一般说法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而以后者为最突出,且有划时代意义。这不仅是相对于以往的中国历史而言,并且对照以后的发展,如 50 年代巴人的“人情”论和您的“文学是人学”思想,以及 80 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观点等,更能看出从五四绵延至今的人性、人道或个性思想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何种意义。从反面看,人道主义一直受到极“左”思潮的批判而始终遭压抑,也可以证明它的积极意义。

钱谷融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不仅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斗争,同时也是东西文化方面的冲突和较量。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反思中,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在封闭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人们在封建宗法和家族的专制统治下,始终受到既定的礼法和伦常道德的束缚,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人人格。这也就是东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也是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之一。李大钊说:国家腐败,非在一端,存亡之计,应当求之于国民的自觉之心。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包括鲁迅、陈独秀等在内)的共同认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一时都对尼采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这个原因。李大钊在 1916 年就写过《介绍哲人尼采》一文,其中说:“尼采(原文作‘杰’——引者)者,乃欲于其自己要求与确信之上,建设真实生活之人也。……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囿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显然,当时的先驱者们是把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当做一种唤起人的觉醒、解放人的个性的启蒙运动来对待的。

吴俊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实质,无疑是一种现代的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的核心则是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意识。从今天的水平来看,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先进民族和发达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素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不断地批判这些据说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观点以后,却发觉,长期以来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如果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均以科学、民主和个性为口号,那么我们在70年代末以前的大约三十年间,则除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外,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与世界发达水平同步的现代思想建设。所以,“十年动乱”结束后在我国文化思想界重又掀起一股现代的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是势在必然。这是补上五四以后脱节的课。

钱谷融 确实可惜,五四的启蒙运动未能坚持下去,启蒙的使命未能彻底完成,启蒙的成果也未能很好地保存和坚持,历史就又很快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般来看,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大都经过了一个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由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历程,这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不过,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追求阶级、民族解放的时候,并不需要否定和贬斥个性解放。从世界观、人生观来说,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当然有根本对立的地方。但从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来说,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合理部分,又是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加以吸收,而不是一概排斥的。毛泽东在1944年8月31日给博古的信中曾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十分正确而扼要地说明了个性解放、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是密切相关的。然而,过去长时期来,我们却往往只看到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之间,个人民主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之间矛盾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或是过分忽视了它们之间联系和相通的一面。因

此,对个性解放要求,对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往往过早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对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更是彻底加以否定。从文学领域来看,这种现象(即对个性解放要求和个人主义思想采取严厉批判的历史现象)比较明显地是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出现的。这种态度,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它缺乏对社会和人的思想的历史发展的应有的了解和尊重。我们中国,在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缺乏起码的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要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非唤醒人民的民主觉悟,解放他们被束缚的个性不可。这就需要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强大的启蒙运动。五四初期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强大的启蒙运动,但终于未能持续多久。由于这次启蒙未能很好完成,革命虽然仍在前进,却往往成了夹生饭,带来许多后遗症。“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这些后遗症的总爆发。

吴俊 就像先生刚才讲的,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中途夭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年代中后期政治上的“左”倾思想逐渐蔓延、扩张的影响所致。以中国新文学来看,最早提出“文学是政治的工具”之类观点的可能是邓中夏,时间是1923年——这个口号最先是由职业革命家而非文学家来提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后,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直至“文革”,这种极“左”思潮便左右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任何叛逆企图或现象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同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末的战争因素一样,政治上的极“左”发展正是使五四启蒙难以继续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我看到在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似乎也谈到了这一点。我想,能否这样说:战争因素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不能继续深入发展的客观原因,而极“左”政治路线及其功利主义倾向,则是它的主观原因?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大概这要算是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吧。

钱谷融 可喜的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令人高兴的。新时期文学已经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只有五四文学才堪与之比拟的局面。我希望它能持久地发展下去,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向世界贡献出我们真正的伟大作品。

作家要有一颗博大的心

——答王雪瑛问

王雪瑛 您是上海市中、长篇小说奖的评委,在审读作品的过程中,您对哪些作品留下了印象?请您具体谈谈对这些作品的看法。

钱谷融 李锐的《无风之树》是一部内涵丰富、情感质朴的好作品,他对泥土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能够用自己的心倾听,用自己的笔传达出他们心底里的声音。他用自己的眼睛发现,经过几番历史风云的变幻,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依然不变。但是小说的后半部分略有重复之感。

朱苏进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作家,《醉太平》是一部不错的艺术作品,看得出作者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孕育的过程,语言洗练而又凝重,有些片断在饱满的激情中,渗透着隽永的哲理,简直有诗的意味。但是作者在描写全书的重要情节男女主人公炽热的情感时,缺乏有力的铺陈,对他们为什么如此相爱交代得不清楚,他们最终彼此作出的选择似乎都不大符合各自的性格逻辑,从而整部作品留有令人遗憾的缺陷。

《苍天在上》是部可读性较强的作品,作者勇于把笔触伸到当代生活中最敏感的区域,但是他过于追求情节的编排和悬念的设置,对人物的刻画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对主人公黄江北的刻画还不够丰满传神。倒是林成森这个人物很值得玩味,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

象,是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在领导干部的塑造上成功的一例。

张炜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厚实凝重,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九月寓言》我很喜欢,这次不少评委都对他《家族》中的抒情部分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很遗憾,由于时间仓促,这部作品我读得有些粗略,就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言,我感到抒情部分的内容应该同小说的其余部分更加紧密融为一体,才会有更好的艺术效果。

王雪瑛 1995年中国有400多部长篇小说问世,据估计今年将有600多部长篇小说走向市场,就数量而言长篇小说的创作生气勃勃、红红火火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就质量而言,批评界采取的是低调处理。一些青年作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是也暴露了他们在文化积累,精神气度,历史意识,语言功底上的诸多缺憾。请问钱先生,您对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现状持什么看法?

钱谷融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容讳言,近年来真正的力作并不多,并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过去多少年来我们历经磨难,遭受过撕肝裂肺的痛苦,而今天又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期待,期望看到震撼人心的力作。

王雪瑛 那么您认为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如何产生的呢?

钱谷融 原因自然不会单一的,值得我们,特别是作家们去探索、思考。你可能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作家与写家的区别。我认为一个写家,他只要有生活,有写作技巧就能写出作品来。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单有生活和写作技巧还是不行,他还要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的心灵,一颗易感的,能承受巨大的苦难,而又坚韧不拔、为了人民和社会的前途而奉献自我的博大心灵。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不得不写的。”不写出来他的一颗心就不得宁静。真正伟大的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发自灵魂最深处的至性至情。司马迁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过去,我们只强调反映现实,作家

们一味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再现，作品往往缺乏高远的思想和情致，造成了创作上的偏颇，而现在有些作家的创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品写得很玄虚，里面的人物不像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写的事件也令人难以捉摸。当然，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信奉不同的主义，但是这些流派、主义、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当作什么时髦的东西，去随便搬来，随便套用的。作家只有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才能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才能产生动人的力量。

我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文坛涌现了许多新秀，为我们的创作队伍注进了新的血液，无论在创作题材、思想和技巧方面，他们都有新的开拓。但在高兴之余不免也有一点遗憾和担忧。这些新进作家似乎写得很匆忙，来不及仔细推敲和琢磨，在语言上、结构上还有许多毛病，在他们的作品看来还只是半成品时，就拿出来发表了。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以为文学创作并不是什么艰难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以为只要凭自己的才气，随意挥洒就成。甚至有“玩”文学的说法。而社会也似乎不知道怎样好好地去爱护他们，一篇作品成功以后，就拼命地向他们喝彩，并争相向他们索要更多的作品，使他们忘记了，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进一步认真地培养和锻炼自己，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要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成就，必须对它有真正的爱，肯为它尽心竭力、专精致诚、潜志凝神，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好作品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会产生。

王雪瑛 散文是各种文学样式的话语基础，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的加深，使散文这种边缘性、随意性很强的文体成了现代人释放自我、袒露心灵的园地。请问钱先生，您近年来读了哪些好散文，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好散文的标准。

钱谷融 我比较喜欢黄永玉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自然、散

淡。柯灵的有些散文我也爱读，文中处处渗透着作者的真性情。就文字而论，他的散文极其干净洗练，有一些写景抒情之作轻灵淡远，仿佛晋宋小品。

散文，看来是最容易写的，其实也是最难写的，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我认为散文要有真性情，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的写法上立论的。我却想从人这个创作主体来讲这个“散”字，就是人要散淡。能够散淡，才能不失真我，任何时候都能够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愿意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望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自由的最高境界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今天又是一个开明的时代，希望我们的散文作者，能够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长处。

王雪瑛 散淡对现代人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钱谷融 当然，不管什么时代，散淡都是一条艰难的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人人要走也都可以走的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引人赞叹。

关于无边的人道主义

——与殷国明对话之一

云南学者马旷源先生仰慕钱谷融先生的人品学识，从楚雄奔于门下，在上海进修一年。他在《钱谷融先生的“平常心”》中谈到了人道主义：“钱先生是提倡人道主义的，他尝自白：我不讳言我是个人道主义者。而钱先生的人道主义又是无处不在的，他不仅仅写在文章里，而且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中。当年，他写《论“文学是人学”》，使了一个障眼法，说这个提法是高尔基的。时过境迁，经过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的。他开宗明义就说：‘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受到批判之后，他还是说：‘现实主义者对生活抱着积极的态度，把人当作世界的主人来看待，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他是用一种尊重的、同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特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这些话均写于乍暖还寒的1957年，其后，先生遭

到了漫长的批判,充当急先锋的,是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然而,这批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莫过于近日被杀的一位女作家,当年她曾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为题,代表在读的大学生们,‘怒斥’乃师的‘谬论’。但时过境迁,当新时期到来之际,也还是这位当年的造反者,却第一个率先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以其力作《人啊,人》轰动了文坛,也轰动了中国。这事,我没有敢向先生核实,但我相信,以先生一贯博大的胸怀,对于这种转变和回归,必然是欣慰的。”看来,要理解和把握钱谷融先生的思想理论,就得首先理解和把握人道主义这个核心和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钱先生几十年来一贯坚持人道主义,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坚定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于人道主义自身在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思想发展的坎坷命运和重要地位。

殷国明 钱先生,您最近在谈到当代文学创作时强调,一个伟大作家,首先要有一颗博大的心,并且再一次提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这能不能说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拥有这种博大心灵的基础?

钱谷融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端是以人道主义为其核心观念的。我们可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为证来充分证明这一点。比如,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等,就是十分鲜明的例子。无怪乎茅盾就曾说过: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目标;郁达夫则以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鲁迅也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弹指七十年过去了,但我们现在是否就能以为人道主义文学在中国已经成熟发展了呢?只要了解中国现当代的历次文学论争,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殷国明 但是人道主义是一个很宽泛的观念,很难确定它的内涵,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保守的观念。

钱谷融 对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人道主义文学观,既强调对人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也强调人本身的个性意识。它既是一种理论观点,也是一种文学精神,但不管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精神,它都试图将文学的存在与人类的生活感受和心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合二而一的崇高境界。我认为这是文学永恒的基本所在。如果从中国的整体文化方面来考察,那么,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还鲜明地具有一种革命意义,这就是它突出的现代启蒙性质。这是“五四”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扬,同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人道主义文学在当代无疑扮演了一个革命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更没有理由说它是保守的。

殷国明 我记得这也是《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种基本思想。

钱谷融 没错。不过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作家世界观问题展开的。我的观点是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很大,它与创作方法并不矛盾。显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但所谓世界观,是人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在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不是全部世界观中的每一种观点都起着同等的作用,而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殷国明 对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讨论,现在看来,当时主要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实际上是,要在指导思想划归统一,解决“立场”问题,结果必然是作家评论家思想独立性的丧失。

钱谷融 也许在回顾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当时首先考虑到的是文学的生命力。因为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大师都无不尊重人,他们的作品中无不闪烁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彩。比如巴尔扎